

DUKU

读库

1102

DUKU

读
库

1102

主编 张立宪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读库1102/张立宪主编. —北京:新星出版社, 2011.4

ISBN 978-7-5133-0238-8

I. 读… II. 张…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IV. ①I217-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数据核字(2011) 第052234号

读库1102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经销电话: 010-83398809

官方网站: www.duku.cn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邮局67号信箱 100036

印 刷: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645×925 1/16

印 张: 20

版 次: 2011年4月第一版 2011年4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238-8

定 价: 30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

DUKU1102

威廉·莫里斯 绘

编号: 1102

DUKU1102
2011.4.6

01-55	物之物语	戴明贤
56-74	戈麦之死	王 锐
75-143	暗自揣度	张家荣
144-156	阅卷	杨义敏
157-163	我的高考	张 鸣
164-190	外科之花的艰难绽放	李清晨
191-223	在书中，我老了	熊 葳
224-232	末世风月	王 鹤
233-317	卯年记忆	影像志

物之物语

戴明贤

一样生，百样活。

——贵州安顺民谚

种种不起眼的居家小物件，年深月久仿佛就成了精。木然漠然呆着，不学狗摇尾巴猫跳主怀，你不理它它不会理你。与你相忘于咫尺，相忘于终日累年。猫狗有它们自己的历史，小物件却负载着你的历史。冷不防一瞥瞥见它，一念念及它，一用用到它，它就会拉回逝去的时间，唤醒远去的亲人，重演依稀的旧事，俨然成了一段历史的发言人。

这些小稿的动笔，起因于一次饭后围炉的闲话。大约是说起家里一件什么东西的来历吧（这种故事平日不知讲过多少），儿子忽然道，要是把这种有来历的物件集中起来写本书，肯定有意思。我一听，这主意不错。

开始动笔，是在2008年年尾。及至基本完稿，不觉已到了2010年岁

暮。回头一看，写的是“物”，成的却是数十位亲人师友的人生轨迹，而且尚存者已然寥寥，不禁生出“此身虽在堪惊”之感。陈与义《临江仙》曰：

忆昔午桥桥上饮，坐中多是豪英。长沟流月去无声。杏花疏影里，吹笛到天明。

二十余年如一梦，此身虽在堪惊。闲登小阁看新晴。古今多少事，渔唱起三更。

我没有堪称豪英的朋友，也没有杏花影下通宵吹笛的韵事，学习写作几十年，笔下只有小人物的蝼蚁生涯。袁枚的《马嵬》诗最得我心：

莫唱当年《长恨歌》，

人间亦自有银河。

石壕村里夫妻别，

泪比长生殿上多。

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黔首黎庶，与强势者同样是构成历史的成分，且能补充官修史册的空隙。

竹节紫砂杯

近些年风行紫砂茶具。我对此不甚措意，却也收到过多套友人馈赠的礼品。大多转送子侄辈了，只留下两三把造型悦目者。值得一说的，是四只旧茶杯。

本是全套。一壶，四杯，竹节造型。一个方木盘，盘心是一片花卉圆瓷。民国时代产品，绝无拍卖价值，只有纪念意义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大量国立院校内迁，我家乡安顺接纳了军医学校和兽医学校两所大专。不知通过谁的介绍，我父亲把他的前后两间卧室让出来，借给兽医学校附属医院的张院长夫妇居住。一直住到抗日战争胜利，难民纷纷回乡之时才离开。

那时安顺小城热闹非凡。大街两侧摆满难民出售家用杂件的地摊，也就是“跳蚤市场”罢。小城整天人头攒动，人流汹涌。张家夫妇的

生活却是静得出奇，从早到晚没有一丝声响。麻脸的张院长每天上班下班，我还偶尔在院子里得见；张太太却是童话里被父王锁在高塔里的公主，绝不下楼一步。我母亲常背地赞叹她的风度，我却似乎没有真正见过她的面貌。有一天黄昏，我在院子里挥舞长竹竿，追打飘掠来去的蝙蝠，偶然瞥见被夕阳烧得金灿灿的窗影里，张太太倚着窗子在望远处。后来猜想，她一定是在想念日寇铁蹄下的故乡，就像大姐唱的那支歌：“小楼上的人影，正遥望点点归帆。”这支流行于抗战时期的歌，我至今没忘。词作者杨友群先生，毕节人；曲作者汪秋逸先生，浙江人。当时都在贵阳教中学，合作了几首好歌。

我父母与张家夫妇成了好朋友，常常在晚上去陪他们说些闲话，让两个异乡人不太冷清。而我，却是与她家的老勤务兵结下了无情缘。这位老兵不仅穿得整洁，皱纹密布的小脸洗得亮亮的，连那把小菜刀都是通体雪亮，没一点锈斑，像现今才有的不锈钢刀具。张家厨房是我家堆杂物的一个小单间，与大厨房隔园相对，灶上地下清清爽爽。我常去看老勤务兵干活。看他煮极少的饭，炒极少的菜，炖极少的汤，一切做好，用长方大盘摆好，端上楼去。我家人多，天天大盘子大碗，张家饭菜看去很荒谬，不像真的，像是“办姨妈”的玩具。但又觉得很精致，一定特别好吃。老勤务兵自己在厨房单独吃。有一次我闯进去，见他端着碗，看着小窗外的园子发呆。最令我纳闷的是他炼猪油。买的是净肥肉，切成极小的丁，炼完的油渣，已缩成豆样的小粒，通通倒进垃圾桶。接安顺人习惯，油渣炒豆豉是一道好菜，我至今酷爱。参观老勤务兵做饭的全过程，我绝不开口，他也绝不开口。他常常蠕动着瘪瘪的嘴唇，不知是在骂日本鬼子，还是在作唇部运动。我看他做饭记不清多少次，却似乎没有对过一句话。做饭有什么好看，但我常去看他做饭，至今莫名其所以然。

一天，母亲说，昨晚在张太太屋里说闲话，三更了，忽然听得“老呜唔”在很近的地方叫。安顺人认为这是一种怪鸟，以其叫声为其名，叫它“老呜唔”。说它只在深夜啼叫，在哪儿叫，那儿就要死人。小孩偶尔中夜醒来，听见那不动声色、无一点余音的老妇人一般的叫声，确实很恐怖。张院长和我父亲立刻到窗口去望，发现是一家屋脊上蹲着的

一只猫头鹰。张院长有手枪，对着开了一枪，没打中，簌簌飞走了。相对大笑。但我母亲心里不服，因为猫头鹰都是“咕咕”叫，没有叫“呜唔”的。

抗战胜利，难民们喜极而泣之后，纷纷筹划归计。张院长夫妇决定立即动身回乡，我父母力主稍安毋躁，等院校回迁时一道走，万无一失。但他们归心似箭，还是加入最早返乡的人流。没想到在途中遭到抢劫，夫妇俩都惨死了，老勤务兵挺身护主，也死了。消息传来，父亲震惊，回家告诉母亲，母亲堕泪不止，一再痛惜张太太那样的好女子。

告别时，张院长把他日常使用的这套竹节茶具送给父亲作纪念。张太太也要赠我母亲纪念物，我母亲就要了一只铁皮饼干盒。盒子很平凡。我母亲一直使用到她1989年去世。这套茶具，几十年总摆在父亲房里，从不使用。我们都知道这是他珍惜之物，小心着不去碰它。

我的童年与抗日战争密不可分。在家里，有借住的张院长夫妇和他的老勤务兵，有母亲代为抚养的难民遗孤小毛毛。毛毛的妈妈张惠是我大姐明端的老师，生毛毛七十天就因产后寒去世；爸爸祝寿庭在中国银行做事，年轻轻带不了婴儿，我母亲应大姐之求，接来抚养，直至七岁才接回上海，祝先生也与我父亲成了好朋友。还有在我家住到抗战胜利才返乡的两个女学生，也是大姐招来的同学。街上更是挤满难民谋生的地摊、小吃摊、哄小孩零钱的抓糖玩具等等，无奇不有。对我最有吸引力的，则是这些“下江人”带来的话剧、音乐会、广场演出。它们是我的艺术启蒙功课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城里乱哄哄的，我二姐明坤经亲戚介绍，去天龙乡下一个屯堡人家小住养病。随身带了这把紫砂壶。屯堡人祖籍江淮，家家嗜茶，房主十分眼红这把壶，天天赞不绝口，离开时只好送给了他。明坤患的是肺结核，又亲历两次抄家的刺激，所以想躲个清静。但生活不便，也不见得安静多少，很快就回来了，终于在1967年5月病故。

四只茶杯，有一只被表妹永宗小时候摔破，用钻铆古法补起。某年夏天，竹城举行赛壶大会，得首奖的是一套清代名家壶。我近前瞻仰，见四只杯子的造型和内壁开片瓷，都与我家这四只杯子一样。但那是绿

砂。价值当然也天地悬殊。那只方盘中的圆瓷图案是玫瑰花，可能是日本瓷。此盘也还健在，而上述与它有关的人，包括打破一杯的表妹在内，一个也不在了。易碎的陶瓷，也比人经久些。

三枪自行车

先父有一辆三枪自行车，是当时有名的英国品牌。有百事通说，这车的三脚架用了三管枪筒的钢，所以叫三枪牌。这大约是望文生义，强作解人。这车特别轻，比后来的国产车要轻近一半。

此车大约是上海香港沦陷前，父亲托购到安顺的。但也只是推测。全家搬入新宅后，我天天见它在四进楼上靠墙立着，盖着几张牛皮纸。我时不时会掀起它的盖头来，瞻仰一番。它匀称玲珑，亮光闪闪。搅动一下脚踏，辐丝就无声地飞旋、闪光，车身就悄然颤悠，整个一副贵族气派。我就会联想起小说里的赤兔马、乌骓马。那时候，小城就是把自行车叫做“洋马儿”。

我没见父亲骑过它。只有族叔海福隔三岔五提了去，一两个小时回来了，一副浑身舒畅的模样，把车擦干净放回去。他很以车技自豪。我多次听他向同仁们夸耀，如何一气蹬上东门坡顶不下鞍，全城再无第二人能做到。一是车好，二是技术好。很长时间里，二叔是此车的唯一骑手。他当时二十多岁，是安顺城玩时髦的领军人物：三件套西装、尖头皮鞋、发蜡、“五一”型派克钢笔，比我父亲讲究得多。还吹口琴、唱《桃花江》、《毛毛雨》。至今健在。前年因事去安顺，与妹妹们去看他，九十岁的人，旧事还记得一清二楚。临了硬把我们送到巷子口，妹妹们又把他送回去。

1951年，父亲参加昆筑工商界参观团，去北京东北观光回来，听从政府动员，留在省城参与经济恢复工作。家庭陆续迁到贵阳，自行车也在其中，就归我骑了上学，往返于贵阳花溪之间。我经常与同班好友李必雨同车往返。我们发明了一种接力客运法：他往前骑百余米，把车停右路边，自己往前走；我走到车旁骑上去，越过他一段路，又把车留

下，自己往前走。这样，相当于两人都一半步行，一半骑车。当时公路上行人极少，社会秩序也好，才能出台这种办法。不久，五花八门的政治运动接踵而至，必雨的母亲、谢友仪的父亲都“犯了错误”，送去清镇一个农场劳教。一个是信“一贯道”，一个是在区邮局局长位上因经济问题失职。必雨和友仪就轮流着骑上三枪车去探视送物。几十年后面，他俩还没忘记这辆车对他们的帮助。

校园里渐渐增加了几辆自行车，足球场上常见有人学车或炫技。一次，一位低年级学友打来战表，要与必雨和我比赛“围车”。围车者，两车很慢很慢地互相堵截阻挠，先倒者为输；但不能碰撞推击，讲究“定车”平衡的技巧。单车对于我们纯属代步工具，从未练过这些花式，只得认输了事。我们中间车术最好的是梅乐明，常在球场上反背骑车，像八仙里的张果老倒骑驴背。他骑的是一辆东德的“钻石”牌。这种车的钢很软，横杠往往一碰就弯了，人们就叫它“暂时”牌。

后来三枪车归还父亲骑了上下班。这时他的身份已是右派了，撤销职务，降三级工资，任省工商联驻会委员。我还真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学会骑单车的。他一直骑到七十多岁，经母亲多次劝说才作罢。犹记儿子岁半时，带着他在阿嘛照相馆门外，等父亲下班来一起照相。他在人丛中稳稳驶来的情景，宛如昨日。那时他快七十周岁了。这张相照得很好，去世时就用他的这一半放大悬挂，看去像是五十出头的人。这辆车，后来多是大弟在骑。他是下乡知青，后在沿河的乌江轮上当水手。每回贵阳休假，就骑着它运送在遵义工作的妹妹、在花溪工作的表妹等人，往返于车站，甚至直抵目的地。

这辆自行车对我家的服务，真是鞠躬尽瘁。内胎外胎经常补，更新换代几轮回。后来连横杠也裂了，焊起来继续用。修车师傅说，那钢管薄得像纸壳，烧焊却费了大劲，真了不得。有一次，我到第一浴室外面的车摊打气，意外地发现摊主竟是相声艺术家欧少久。他是抗战期间从北方逃亡到贵阳定居下来的。当时与亚司令并称西南相声名家，在重庆文艺界的联合演出中，与老舍说过对口相声。我在民教馆灯光球场听过他不少段子，都是传统老段，《卖布头》、《黄鹤楼》、《戏迷传》等等。后来从音像资料中欣赏到京津名家的这些段子，欧少久不比谁差。

五七年当了“右派”，就退出历史舞台了。没想到他在干这个。

欧先生（认识的人都这么叫他，他自己说段子也这样：“那位问了，‘欧少久欧先生……’”）接过单车就是一声：“喝！三枪牌！”随即说他跨下也是三枪牌。我一看，敢情比我这辆还老。欧先生是瘸子，又胖，穿得邋里邋遢，一拐一拐地干活，一边还夸三枪牌：不光是钢好，三角架设计得更完美，蹬着上坡“像有台小发动机似的”。我站一边，却想的是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。我觉得他跟这两辆三枪牌很是相似。

最近打听得知，欧先生十年前才去世，享年八十岁。早已“落实政策”，还分给一套宿舍。他们这一辈人，只要是熬过“文革”才走的，我都认为有晚福，因为看到了反常识时代的结束。欧先生的晚福当然又更大了，我父亲就没这福气。他辞世于1974年初，正是大雾弥天，举世惶惶然不知“中国之命运”安在的年月。

欧先生在贵州收过几个徒弟，但资质不佳，都不出色。

车以“三枪”为牌，是不是煞气重了，克主？

太平洋石子儿

一位数十年没见过面的低年级校友，忽然来电话，说是刚从美国儿子处回来，老同学谢虎生托他捎了一袋“太平洋的小石头”给我。次日就来访，把这份万里迢迢的礼品交给了我。

谢虎生是我的世交学弟。其尊翁根梅先生与先父同事，是竹城有名的箫王。五十年代初期，广播电台就放过他的演奏。有一段时间，他上班的南明烟厂办事处与我家同院，我每天都听他吹箫。除了吹古曲，还吹自度曲，听过的有《坝桥观瀑》、《布拉格之春》等等。大女儿是大画家赵无极的元配夫人，居住法国；二女儿在泰国经商。他因此成了替国家挣外汇的统战人士。不料“文革”之前的“四清运动”里，这身份一变而成为里通外国的可疑分子，被通知去与“管制分子”（地富反坏右）们同堂听训。他悲愤交加，眼压猛升，散会走

到门口就双目失明了。百般医治无效，从此在黑暗中生活了十多年。我和妻子去探望，见老人很乐观，在编撰韵书以自娱。问起吹箫，说是会引起眼压上升，被医生禁止了。虎生是个不安于现状的人，干过多种职业。三年困难时期，扛着猎枪进山，大开杀戒，改善生活。后来成为手艺超群的汽车修理工，那年头最趾高气扬的货车司机们，在他面前低声下气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他找了个机会，孤身去美国闯荡。所遭遇的夹磨折腾，可以写一本五百页的大厚书。他自少年时就有冒险精神，又继承了乃翁的幽默感，2007年回来约我见面，像讲笑话一样说些海外奇谭给我们听。他夫人是医生，给他当留守夫人，上班、育儿、服侍长年卧病的公婆（对面两间屋，一边躺一位长年卧病的老人），直至一一送终，然后带着儿女去美国团聚。虎生自小诙谐，又胆大敢冒险，这一年熬到领退休金了，回来逍遥，约我见面，讲笑话一样说了很多在异乡打工，如何与老外斗心劲斗狠劲的故事。我大笑之余，心想换成了我，绝对活不出来。

他来舍间，看见我喜欢石头，所以回去后要捡小卵石送我。我把这些小石子浸在清水里一看，不论石质、形状、色泽、花纹，一样谈不上。但冲着太平洋这个牌号、亲手捡拾这份心意、几万里这段路程、飞越大洋这份劳动，也就足以抵偿一切。我从中选取了一小半，放入一个玻璃钵，灌上清水，垫个瓷盘放在茶桌上。无事时瞥一眼，咀嚼咀嚼其中况味，重温重温谢家故事。懂石头的朋友来看了，听了来历，也会像看外国留学生唱京戏，虽然扮相咬字不地道，却会宽容一乐：“洋票友，容易吗！”

这堆石头中唯独一块能有点“说法”：灰黑底色上，细白纹形成一个清晰的“弗”字。我想，要是多一个人旁，成“佛”字就有含义了。可惜！忽然又一想，这不是个美元代号“\$”吗。这一想，乐了：小时候，老师说这符号的读音是“打那石”，看中什么东西，把此“石”往“那”儿一“打”就行。不知是否真这么读。我家乡盛产幽默家，很多话当不得真。

“\$”石，巧，真不枉是美国来的。

虎生有一位同学周清筑，有几年每逢中秋节，就带些糍粑毛豆之类

去看望谢老。我听了感动，用这件事写了个短篇小说《无声箫》，至今是个初稿。几年没见过周清筑，听说头发和大胡子全白了。他的宿愿是把儿子从小培养成足球健将，以弥补自己的大憾。这个愿望也落空了。造化岂能听你安排。

附记：虎生2010年来访，赠我一本他姐姐景兰女士的画册。多年前，她不想老是生活在赵无极先生的光影下，与之分手。记得“文革”结束后，她回来省亲，曾应省美协副主席、她老同学秦元魁先生之请开过讲座，介绍西方现代艺术。她带来很多幻灯片，边放边讲，不啻给长期封闭的贵州艺术界打开一扇窗子，放进了大量的奇异景色和新鲜劲风。谢、秦二位，如今都已不在了。连学弟周清筑也不在了。

《聊斋志异》和《扫盲课本》

《聊斋志异》写的是狐仙鬼怪，《农村扫盲课本》写的是稻麦镰锄。我因之回忆的却是两个乌蒙山民。

长达十年的“文革”，像是一个鬼屋梦魇，人在梦境中心惊胆战，就是醒不过来。这场漫漫梦魇又分成许多阶段，内容不断变化，越变越叫人摸不着北。当时称为“很不理解、很不认真、很不得力”。于是经常生分歧、闹分裂、打派仗，真理越辩越糊涂，随时能闹出大乱子。怎么治呢？“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”。于是处处事事大办学习班（全称是“毛泽东思想学习班”），宣讲正确方针，统一思想认识。当时我在乌蒙大山里教中学，中小学教师是常有机会与区乡干部一道进学习班的。有一次，区革委按照上级统一安排，举办一个教师在内的“学习班”，名目和主题记不起了，因为过于繁多。实际上从主持者到参与者，没人把它当回事，口中不说，走个过场而已。而且在那“口中淡出鸟来”（梁山李逵语）的匮乏年月，还是改善几顿伙食的难得机遇。

这次学习班，为示意义重大，选了一个不近不远的公社作班址，以免家住区里的干部和教师逃学。有一下午三点过钟，按常规休息“分半钟”。农村干部的“分半钟”，相当于北京时间的三刻钟至一小时。这

时，区小学的谢、何两位老师约我“出去走走”。

原来何老师家离此不远。去到他家，他把大铁锅坐在大土灶上，说要炒板栗招待我们。我说时间哪里够？他笑道：三分钟包你吃到“离壳板栗”。他用大木盖罩起铁锅，一会儿揭开，锅底已烧得通红透明。再把棕口袋里的板栗倒下去，罩上锅盖，紧紧压住。锅里很快乒乒乓乓响起来，像放爆仗似的，击打着锅盖。渐渐停歇无声了，揭开，一股青烟冒过，黄澄澄的板栗们夹杂在褐红色的破壳里。果真三分钟吃上了炒板栗。

吃了板栗又说要去办一件事。我提醒该回去了，他俩嗤之以鼻，说还不早“放羊”了，回去连大会主持人也找不着。于是跟着他俩走。谢老师告诉我，此去是应一位民办教师之请。这位教师身患重病，居家多年了，几次带信说他来日不多，有件事定要交割清楚才能瞑目。但谢老师也不知道是什么事。

走到中途，见一座孤零零的茅草房立在旷野里，离小路五十多米远。谢老师说，这位房主人他认识，可以去讨杯水喝。走到门外，吆喝了几声“老×——”（忘其姓），无回应。他把虚掩着的两扇小门一推，径自登堂入室。

典型的乌蒙草房：堂屋有门无窗，屋里幽暗、凉爽。一具大石磨。一口大水缸。水缸边一副水桶。墙角大小锄头。此外别无长物。谢老师舀起半瓢凉水，咕咚咕咚喝了一气。我瞥见侧室里亮堂堂的。谢老师说：进去看嘛，没关系的。我跟着进去，见土墙上开了个很大的方窗，用篾架糊白纸挡着，光线就从这里来。很深的窗台可以当小桌用，摆着小油灯。一具小木床安在中央，挂着白夏布帐子，两边用竹帐钩挂起来。床上一袭薄被。很常见的乌蒙茅舍，却是干净得太不常见。这时我发现枕头边有一小摞书。取过一看，赫然是《聊斋志异》。民国时期的石印小本，油光纸，楷书写得很端正，带夹批夹注。是我小时候最常见的版本。

我非常惊异，心想是不是闯进笔记小说里那些隐士高贤、风尘异人家家里了，连忙向谢老师打听房主人的详情。他诧异道，就是个普通农民。不是队干，也不是地富分子，身世没问过。我说，不对，这

人肯定有点来历。我有心等主人回来一见，他们说倒早不晚的，不可能现在回来，并应允找机会了解。于是怅然跟着他们离去。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
造访的第二家，是此行目的地。那位退休多年的民办教师住在一栋木楼里。楼下是教室，他妻子正在为复式班上课。见谢老师来了，就安顿好学生，陪我们上楼。楼梯极窄，地板极薄，我们的脚步把整栋楼震得起伏伏，吱吱嘎嘎。

那位教师非常瘦削，苍白得半透明，但一双眼睛射出炽热的光，说话很亢奋。明显的肺癆晚期。他说，特意请谢主任（区中心小学教导主任）来交代的事，是1958年“大跃进”中，向区中心小学领来的几十册《农村扫盲课本》，现在还保存着，一直没机会送还中心校，成了一块心病。谢老师听了哭笑不得，力说这种课本早就就是废纸了，当年经手的人也已东离西散，莫再当回事了，静心养病才是要紧的。但那位前民办教师连连摇头，执拗地再三说：这是我的手续，我是打了领条的。最后谢老师只好说：记住这事了，有便车时候再来取。我们起身告辞，吱吱嘎嘎走下小楼，从盯着我们看的小学生中挤出来，回去吃大会伙食。

那是“人妖颠倒是非淆”的时代。这两位偶然见到的乌蒙山民，一个执著如火，一个散淡如水，从此令我不会忘记。我羡慕那位在大混乱中能青灯素帐读聊斋的“高士”；钦佩那位在谎言世界里牢记旧债，视诚信胜于生命的君子。

这倒真像是蒲松龄散失在乌蒙大山里的两段“聊斋”。

穆瑙杯垫

1989年的整个元月份，我是在奥地利度过的，最后一站是穆瑙，一个小巧秀丽的古老城镇。登车前，与全程陪伴我们的德查克和施蒂克女士，在火车站小餐厅喝了杯告别的啤酒。德查克把三个酒垫放在我们手中说，这就是纪念品。

一个月里，我们在一起总喝了有二十多次啤酒。边喝边闲聊，我一

次次感受到不同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的异与同。遇同令人欣喜，遇异觉得新鲜。

有一次晚餐后呷着酒，施蒂克说今年雪不厚，没怎么滑够，盼着夏天早些来，到湖边去玩个尽兴。并且补了一句：要抓紧时间，不然就玩不动了。我说，我们有句唐诗说：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”小徐用德语叽里咕噜一通，不想一贯稳重的施女士忽然激动起来，叫小徐再讲一遍，然后喃喃自语。小徐说她在重复这两句诗，不停地夸好。接着她要求我把它写出来。我用餐厅的便条纸写了，她拿着看了很久。想来这十个方块字肯定给了她一种很神秘的感觉。

小徐很得意，说他的译文也是很美的德语诗，所以感动了女士。我也很得意，没想到我们中国这句家喻户晓的诗，千年之下，引起了一位异邦女子如此深切的共鸣。于是我说，这位诗人还有两句千载传诵的诗：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”小徐又叽里咕噜译了过去。谁知这回却碰了壁。施女士连声说好不好。我想她是仓促间没有悟出妙喻，就加以一番解说。小徐一边翻译，女士一边乱摇手，说道：反正我不喜欢小虫！我这才恍悟其间的隔膜。西方人可以把鳄鱼大蟒当宠物养，而对各种小虫怕得要命，汉诗中作为抒情意象符号的蝉、蚕、蟋蟀、蜘蛛等等，在他们只觉可怕而引不起丝毫美感。几天后，施女士带我们去拜访一位刚从西藏旅游归来的女画家，说是她带来了中国的笔墨纸张。到那里一看，笔墨确有，只是太粗劣，纸更是厚硬的洋货。这位女画家是从尼泊尔进出西藏，没买到地道货。施女士立刻叫我写李商隐的那句夕阳无限好。显然这正是她来此的主要目的。我遵命写了。当然不满意。向她声明这张不作数，以后一定写了寄来。

我们到格拉茨市的第一个周末，是应施女士之邀在她家度过。第二个周末前，她说明天下午还是去她家，喝匈牙利汤，说是带中国风味，我们会喜欢的。我客气说，上周才去过，怎好又去叨扰呢！她听了小徐的翻译，说是已经准备好了，就再去这一次罢。我顿时省悟：无意中又发生文化冲突了。多年读西方小说，见他们串门会晤的习惯多是固定的，星期三谁来访，星期六去谁家喝下午茶，等等。显然是东道主同情我们万里为客，想以家中接待的最高礼遇，让我们周末也能感得一点家庭的